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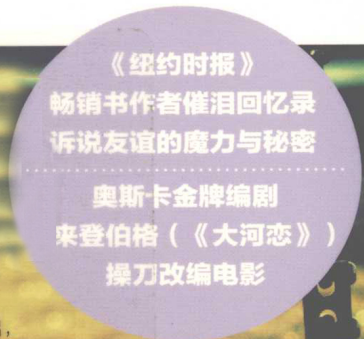
A True Story of Lifelong Friendship

[美] 鲍勃·格林 著
裔传萍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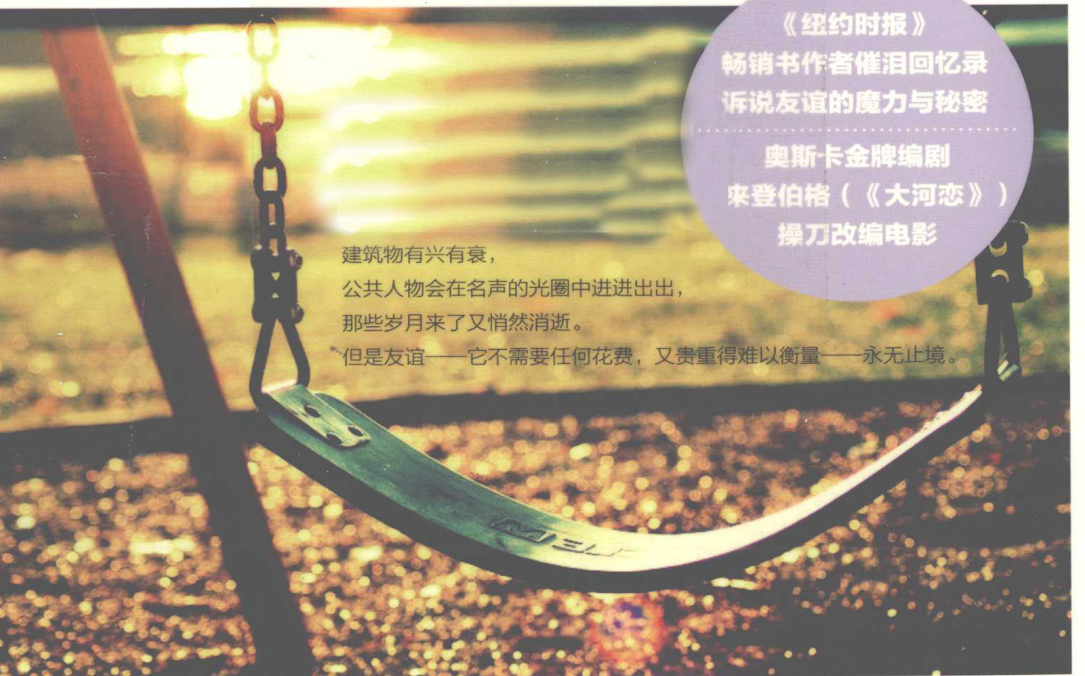
And You
Know You
Should
Be Glad

知道吗，你应当快乐

一段经历
一辈子友情
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



《纽约时报》
畅销书作者催泪回忆录
诉说友谊的魔力与秘密
.....
奥斯卡金牌编剧
来登伯格 (《大河恋》)
操刀改编电影



建筑物有兴有衰，
公共人物会在名声的光圈中进进出出，
那些岁月来了又悄然消逝。
但是友谊——它不需要任何花费，又贵重得难以衡量——永无止境。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知道吗，你应当快乐

And You
Know You
Should
Be Glad

裔传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7662 号

Bob Greene

**AND YOU KNOW YOU SHOULD BE GLAD:
A True Story Of Lifelong Friendship**

Copyright © 2006 by John Deadline Enterprise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道吗,你应当快乐/(美)格林著;裔传萍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303-8

I. ①知… II. ①格… ②裔… III. ①自传体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9823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潘丽萍

责任编辑:曾少美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303-8
定 价 26.00 元

致本书的读者……

及你们最好的朋友

—

我们缓缓向奥迪莫菲山走去。

房子位于阿德莫尔路和埃尔姆路的交界处——阿德莫尔南路二百二十八号门前有一小片临街草坪，房子就在草坪的北面。我们刚成为最好的朋友时，他——杰克——就住在那里。那时候我们才五岁，而现在，我们已五十七岁，还是站在这块草地边，站在奥迪莫菲山旁。

“这山以前是那么陡。”我对他说。

“嗯，那时我们还小。”他答道。

这样的日子快到头了——对我们来说，这样漫步的机会不会太多，以前，我们浪费了许多岁月——但是，每次我回家来看他，我们一定会这样走走。他很喜欢。

这个山坡几乎没什么坡度——在成年人眼里，它实在连山都算不上。但是，在我俩刚开始交往的那些年里——那时二战刚结束，镇上许多家庭的父亲刚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回到家，他们在各条这样的街道上买了房子，重新开始适应和平时期的生活——这儿让我们觉得像是刚刚走出了意大利或北非。我们常常冲上那座山坡——爬上那片宁静的草地，那草地位于安全的俄亥俄街道上，这条街道属于一座仅仅拥有一万三千名居民的小镇——我们手拿棍棒，充当来复枪，假想自己是那位二战中屡获功

勋的战斗英雄奥迪·莫菲。

“也许房子的新主人将草坪修整过了。”当时我对他说。

“没有，”他说，“它原来就是这样。只是以前感觉更陡些罢了。”

我们依然站在人行道上。我想趁他不注意，偷偷看他的眼神，可是根本没有机会。他总是能觉察一切。

“你爸以前有时会观察我们。”我这位最老的朋友说。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再是小男孩，对什么事情都已经不再那么确信了。他有点累了，之前我对他妻子说我们不会走太久。他们的房子离他父母的老房子不到一英里——离奥迪莫菲山也不到一英里。

“我知道的，”我说，“我爸总是开车来接我回家吃饭。”

那些从战场回来的男人——他们会怎么想呢？那时候他们从战场回来还不到十年——十年前，他们一直在欧洲、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然后他们却站在这里，背靠着他们的福特和别克车，在落日的余辉中，等着他们的儿子结束打仗游戏。

“他们当时比我们现在要年轻多了。”我对杰克说。

“他们当时才三十来岁。”他说。

我想我该问他一下，于是就问道：

“你想爬这座小山吗？”

这座连山丘都算不上的山，有时却又显得太陡。在我们小时候，在我们刚开始交往时，这座小山让他气馁，而现在，在一切即将画上句点时，至少是在今天，这座小山依然让他气馁。

“我们回去吧。”我的老朋友说。

我们往家走，往等待他的妻子的方向走去——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他的步履有点蹒跚。

二

如果足够幸运,在生命中,我们都会遇到像杰克这样的人——我们最初的朋友,也是我们最长久的朋友。

如果特别幸运,无论世界将我们带往何方,他们始终会离我们很近。我们不必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不需要天天见面。因为,友谊——尤其是最长久的友谊——根本不需要那样。

没人更了解我们。成人世界碰到的人看不到我们最本真的样子,那时,对这个恼人的世界还不懂得设防,所以也没有在自己周围设立一层又一层的防护墙。后来,虽然还是不喜欢设防,也不愿意修建那些防护墙,但是它们最终还是随着生活一起来了——也被装在了生活这个包裹里。

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在我们懂得设防之前,在我们开始修建防护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幸运的话,这个重要的人物会陪伴我们很长很长时间。

我清晰地记得遇到他的那一刻。

我们在俄亥俄州贝克斯利镇的卡辛汉姆小学上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离他家大概只有一个半街区的距离。

刚去幼儿园的那几个星期是很混乱的——有点激动,又有点不知所

措,但最多的是困惑。你第一次单独一个人。到学校的第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要在一栋房子里开始全新的生活了,而这栋房子并不是父母的房子。在学校里,你是年龄最小的——只有五岁,有时在楼梯上你会看到一些十二岁的学生,他们大声嬉笑,大声交谈,很明显他们彼此很熟,而你却从来没和什么人这么熟过。在那样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很小。当你确实很小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的南头,早晨,里面大多充斥着激烈的噪音。每天,一切都是全新的——课程的安排,用餐的程序,休息的时段,走廊里的钟声……一切都和你以前经历过的大相径庭。

巴巴拉小姐是老师。她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已经有几年了——她的全名叫巴巴拉·德鲁根,尽管我们认为她老得像历史书里的人物,但事实上她才二十岁出头。

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所有人已经相互介绍了名字,但是那么多的名字很难记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巴巴拉小姐每天点名时,都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想她这样做可能是有原因的——她其实已经知道谁在、谁不在了,但是她让我们大声说出名字,这样我们就会渐渐地相互认识了。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努力将名字和脸对上号。

就这样,我们稍稍有些熟悉了——我们不知道卡辛汉姆路上那个教室里所有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一天天熟识起来。

一天下午,我们围着巴巴拉小姐在地板上成半圆形坐着,听她给我们念书。我坐在靠后的位置,突然,我注意到上嘴唇上有什么东西——我感觉有东西正从鼻子里往下滴。

我没带舒洁面巾纸,也没带手帕,于是我抬起手,想把脸上的东西擦去。但是,似乎根本不管用。我用手擦了擦,但是随后上嘴唇又湿乎乎的了。

我看看手。手染红了。我在流血。

我以前也流过鼻血，但是在家里，妈妈总会在近旁，她会带我去盥洗室，然后帮我止血。她会在鼻子上放一张棉纸，然后让我头向后仰，如果需要的话，她还会用冰块。

现在，我坐在地板上，坐在其他五岁孩子围成的半圆的尾部，我再次用手捂着脸，而手很快就沾满了血。

我感到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在那个年龄，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出差错而被当众拎出来。你只想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最好湮没在人群里。

我又用另外一只手擦脸，并尽可能地不发出任何声响。我只是希望能止住血。我把头埋向铺了油毡的地面，希望没人发现我在流血。我把T恤衫的下摆拉到脸上，用它压住鼻子，以为这样就可以止住血。

但是血并没有止住。现在衬衫上已经有血了，而且我越试图止血，衬衫上的血就越多。因为当时才五岁，所以我开始感到恐慌；当时血流得更快了，我浑身是血，衣服上也都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怎么的，我感觉这是我的错。我身子弯得更低了，恨不得埋进地板里，并且尽一切可能让别人看不到我。

然后，离我几英尺处，一个人站了起来。

我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因为我一直在盯着地面，既恐慌，又羞愧。

“巴巴拉小姐？”我听到这个声音说。

巴巴拉小姐大声的朗读停了下来。

“鲍勃受伤了。”那个声音说。

他叫杰克·罗思。我们彼此并不熟，但是每天的点名他都在认真听，所以他知道我的名字。

他站在那里看着巴巴拉小姐，巴巴拉小姐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浑身全是血的我——我被立即送到了学校医护室，他们帮我擦拭干净，还告诉我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鲍勃受伤了。”他连一秒钟都没犹豫。可是,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扰乱这个我们刚刚熟悉的、全新的幼儿园世界;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每天也在谨慎小心地做事,学习习俗惯例,领会规章条例。当时,站起来打断老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因为我们刚刚踏上那条道路,在那条道路上,老师说话时,你就不能开口。

但是他做到了。为了某个不熟的人,他直接站了出来。

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五十七岁了,我们从奥迪莫菲山一直走到他现在住的房子,他的妻子在房子里等他。

我们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放学后的那些时间,我们要么去他家,要么去我家。早些年,我们的母亲几乎总是待在家里;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少在俄亥俄州中部的这一小块地区,按照惯例,母亲都应该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外出工作是不合常规的。

我的母亲总会为我们准备好鸡蛋沙拉三明治;他的母亲常常做托儿豪斯饼。我之前从来没听过别人将那些词连用——“托儿豪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品牌还是作为一种概念,对于我所成长的那个家庭都是陌生的,如果不是遇到杰克,那些词可能一直都将是陌生的词组——但是,下午他母亲在厨房里用烤箱烤饼时,阿德莫尔路上那栋房子散发出的饼香形成了莫大的感官刺激。在户外,在他家那块临街的草坪边,在那座不太陡的斜坡上,我们将自己假想成美国的士兵——但是战斗结束后,我们这些士兵不是回到散兵坑或泥浆四溅的帐篷里,而是从后门往里走几步,回到夹着巧克力片的甜饼旁。

杰克十五岁时,他的母亲过世了。我们这些他最亲密的朋友知道她一直在生病,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她病得那么厉害。当时,他家还花钱在报纸上登了简短的讣告,讣告写道,贝克斯利镇阿德莫尔南路二百二十八号的米尔德里德·罗思逝世了。从那天起,杰克每天下午回去,面对的

只是一栋空房子。他是否曾经感觉那房子欺骗了他——他是否曾经感到内心孤单、失望或空荡荡的；是否曾经从后门走进屋里，打开灯，还来不及想，就已经知道那些令人欣慰的饼香不会再有、不会再回来了——他是否曾经走进自己的房间，闭上眼睛，放声痛哭，他没有告诉我们。

“鲍勃受伤了。”我们五岁时他这样说。

但是当他受伤时，他却将它锁在心里。

如果你在世人的眼里——即使你在当地人的眼里——不是很出名的话，那么你的死讯就不太可能受到大家的关注。

如果你的成就只是默默取得的，而且只有那些爱你的人才会珍爱，那么你也只能静静地离开人世。

朋友就是我们的一切——没有朋友，我们的生活将无比空洞——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朽的魅力典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失去他们——我们都在失去；我们都将失去——我们会意识到，也许永远会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满载着他们给我们的美好、无形的礼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在某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的生命第一次和那些后来成了我们最珍视的朋友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可能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杰克逝世时，当地的报纸上并没有刊登讣告消息——只有一则付费刊登的印刷体死讯。他的一生和他母亲一样，不足以引起日报记者的注意。

你们都不认识他，但是你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他很像。

某些人……某些事。

这是一段友谊的记述。

有些人可以记述一段生命中最宝贵的友谊。如果你很幸运——也许你真的很幸运——那段友谊永远在那儿，或者它会在一个奇妙的时间出现。

三

那些年，我们通了那么多次电话——小时候，我们用黑色胶木做的拨号盘式电话机通话；当按键电话机成为美国家庭的时尚时，我们就用那种电话机通话，那种电话机极轻，而且光滑，线条修长；刚参加工作时，我们就用商务办公室里的电话机通话，那些电话是综合布线的，而且配有闪亮的暂停键；当手机成了全国无所不在、也许最终又令人感到遗憾的一片风景时，我们又用手机通话。

不管我们身在何方，也不管我们前一次通话是在几星期前还是仅仅几小时前，每年中的两天我们总会给对方打个电话，从来不曾忘记。这两天都在三月份。

三月十日，每年的三月十日，他总会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三月二十五日，每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我总会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

又一个三月十日，也是我五十七岁生日，他打电话来，低声轻笑。他说：“你不喜欢五十七，那就一起等七十吧。”尽管远隔数里，但是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笑容。

我俩有所不知。

两星期后，是他五十七岁的生日。可那也将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那个三月末，我在佛罗里达的一处沙滩上散步；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了一些波折，我正在努力将事情理清。我在墨西哥湾待了几个星期，在阳光下散散步，花些时间思考思考。就是在这里，我接到杰克三月十日打来的生日祝福电话；也就是在这儿，我听他半开玩笑地展望我们七十岁时的情形。

自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已经走到了龙布岛的尽头；每天我都会踩一踩那块大石头，然后才转身往回走，往回走差不多十分钟的路程，然后就停下来眺望墨西哥湾。

那天，太阳高挂在天空，阳光十分灿烂，天空中只有一丝丝云彩，墨西哥湾的水特别清澈，清澈得可以看到湾底的沙子。我口袋里装着手机；但并没有响。

在沙滩上散步时还带着手机，这样的人一定是傻瓜吧？以前，大家的生活一定过得十分平静，那时候别人不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也不能不断查看是否有人在找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却常常查看，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一直忍着不去查看北方的芝加哥家里的电话——为什么要破坏这样一个艳阳普照、风平浪静的早晨，去查寻一个更灰暗的世界呢？但是，那天站在那块平静的沙滩上，揣着手机，一只耳朵听着墨西哥湾柔和怡人的浪声，我拨通了芝加哥家里那个专属号码，用力按下了那个必需的密码，然后得知有一条新信息。

“这电话答录机不错，”那个声音说，“我是查克。”

他指的是哔哔声。以前我家语音信箱的应答声是我妻子的声音。她死后，我注意到答复来电的依然还是她的声音，所以我就把她的声音从机器里消去了。不过我并没有替换答复语。答复来电的除了哔哔声，根本没有其他声音。有好一段时间一直是那个样子。

“这电话答录机不错。”查克说。

正因为我在语音信箱里保存了那次来电留言,所以我才知道他确切的用语,以及他接下来说的话。而一些通话往往会永远改变一些事情。

我们五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包括杰克,我,查克·申克,丹尼·迪克和艾伦·舒尔曼。过去在俄亥俄州念高中时,我们称自己是 ABCDJ,即艾伦(Allen)、鲍勃(Bob)、查克(Chuck)、丹尼(Dan)、杰克(Jack)。

查克和我之间的几次严肃谈话屈指可数。我俩之间的交谈,一直以来只有笑声。我经常这样向别人描述,我和查克儿时的交谈是这样子的:就算你告诉他今天半夜就是世界末日,他也许只是脑袋一偏,然后说:“我们去托德尔饼屋吃干酪三明治和香蕉奶油派吧。”其后一晃几十载,我们老多了,但是那种交谈风格并没有改变。

我能够听出查克说话语气的微妙变化——即使通过电话线,即使只是一段电话留言,即使听取这段留言时,我仍然身在佛罗里达州远离大陆的一座珊瑚岛上,手机里夹杂着静电干扰声。从他开始说的那些话——“这电话答录机不错。我是查克。”——我就感到情况不妙。

“打个电话给我,”那个声音接着说,“事关杰克。他身体不太好,我想和你细细说明。所以给我回电。再见。”

查克从来不曾这样和我说话。他身体不太好,我想和你细细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查克从来没有用这些词语来表达。

海鸥在头顶盘旋,海水在眼前闪闪发光,我拨通了电话。

饭准备好后,杰克的妻子向楼上大声喊了几声。

我打电话给查克时,查克这样告诉我。

几个星期以来,杰克的身体显然一直不太好;他以为他患了感冒。他早早地下班,然后就上楼到卧室小睡一下。他让妻子贾尼丝吃饭时叫他,他会马上下来。

查克说,贾尼丝向楼上喊了几声,但是杰克没有应答。

她又喊了几声,然后爬上楼去,想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

她却发现杰克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小学二年级时,希普舍小姐将我们的座位隔开,我认为,这是别人对我们友谊的最大赞美。

希普舍小姐受够了我们之间没完没了的闲聊。当时杰克和我选择了紧挨着的两张桌子——那些桌子的写字平面和椅子是连在一起的,你必须从侧面的开口处钻进去——她之前观察了我们几个星期,发现我们只是闲聊、开玩笑,根本不留心她努力教的东西。一天早晨,希普舍小姐把我们叫到一边,告诉我们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说她看得出我们是好朋友——正因为我们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在教室里,她要把我们的座位调开。她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她不近人情;事实上,她似乎做得非常合情合理。她告诉我们,如果挨着坐,并且整天闲聊的话,我们可能永远学不进东西。她说,隔开一定的距离对我们更有好处。

能有人注意到一段友谊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你俩如此要好,因此不得不将你们分开。

站在佛罗里达州的沙滩上,我听查克接着讲发生的事。贝克斯利的警察和急救队是怎么赶到杰克家,如何把他从楼梯上抬下来的。还说从杰克卧室到走廊的转角太窄,常用的担架转不过来,因此他们只能用一张叠起来的床单把他抬到候着的救护车上。

那么多年前,在教室里,我们彼此被分开过。老师说,那是为我们好。我看着墨西哥湾,在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和我交往最久的朋友离我那么的遥远。

四

那当然是在公交车上。

那才是重要的时刻。

只有他和我会明白。

我们第一次感到像是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第一次感到无拘无束、自由独立——是在我们手里拿着五分镍币，闲逛到车站，然后等贝克斯利公交车的时候。

现在想想，我都忍不住咧嘴而笑。那时候，贝克斯利公交车其实哪儿也没去。它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小镇。它只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只收五分镍币——连续、懒懒地沿着那个不规则的环形路线走，围着我们的小镇开，尽管这个小镇没有制造业，没有工业，也没有观光景点。那辆公交车从来没有离开过贝克斯利的边界。

贝克斯利以前是个小镇，现在依然是个小镇，它的四周都是哥伦布市的地盘。你向任何方向走，都会走到一个更大的镇子。但是贝克斯利的公交车从来没向那些方向开那么远过。有时那车似乎也过了一到两英尺，似乎就要出镇子了，但是司机总会突然地左转或右拐，最后，像往常那样，接着走它的环形路线。

那也正是为什么父母们在我们七八岁时，同意杰克和我自个儿去乘坐贝克斯利的公交车。我们哪儿也没去。在贝克斯利乘公交车就像在迪斯尼世界里坐车——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迪斯尼世界或迪斯尼乐园之类的地方——它和传统的市内公共交通一样。它看起来、感觉起来、闻起来都像公交车——但是它不开往任何别的地方。

对于两个渴望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的男孩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杰克和我总是步行到东大街的公交车站，等候高高的前窗上贴着“贝克斯利”标志的那辆公交车，等着听橡皮边门的气压声，然后吱嘎一声门开了……然后我们就上车了。

从狭窄的踏板上去，把五枚镍币投进投币口——我们的五枚镍币当啷一声掉进司机座位旁的那个玻璃收费箱，那叮当声在我们听来，是新发现的自由之声，那么令人兴奋，那么激动人心。我们飞快地和穿制服的司机大声打个招呼（每天早晨，他穿上那身刚熨过的灰色制服，戴上那顶帽子，明知一整天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乘客，而且这些乘客其实哪儿也没去，他会怎么想呢？），然后就出发了。

许多个夏天的下午，我们是仅有的乘客。我们总是在车的后座里挑一个座位。尽管中午时我们是仅有的乘客，尽管我俩各自拥有半辆车，但是我们依然并肩坐在一起，就像这是在一座大都市里，所乘坐的公交车上挤满了通勤的人；又好像座位很难找到，金贵无比。

我俩就那样坐着，两个小男孩坐在破旧的皮革座位上，穿过罗斯福大街，穿过卡萨迪大街，对于每一站都一清二楚。我们一路聊着……一路上，我们一直看着窗外（就像我们将要看到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一样），谈论着窗外的一切，静静地感受这份喜悦和激动。谢尔和索亥俄加油站从我们眼前经过，然后是索斯金斯药房，爱斯基摩·奎恩冰淇淋摊子，接着是一所中学，中学后面有一块橄榄球场，接着是克罗格食品杂货店，接着就会看到贝克斯利公共图书馆门前的石头。